

# 英语语调性别差异研究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蒋红柳

[摘要]在传统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女性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避免体现权力和显示力量等属于男性气质的各类言行,这一社会传统反映了长久以来男性中心社会制度对女性的规约。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西方学界开始关注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进而产生社会性别概念。在此背景下,社会语言学领域,特别是女权主义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女性话语的研究上,希望通过分析语言的性别差异特征来映射现实社会中的诸多性别不平等状况,其努力体现了语言研究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社会性别;女性主体意识;英语语调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I5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2)01—0189—06

基金项目:四川省2009—2012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P09049)成果。

作者简介:蒋红柳(1964—),女,重庆人,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欧美文化。四川成都 610064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降,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开展了影响深远的妇女解放运动。性别话语分析也从上世纪70年代起,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整个70至80年代初期,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对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的影响表现在部分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社会心理学家对男女在语言使用上的特征及其差异所进行的考察分析。这些考察分析多围绕男性话语霸权、女性话语权力缺失和性别语言差异特征等方面进行。在具体内容上多为透过分析语言性别差异,对男性中心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男性话语霸权的批判,呼吁两性平等以及寻求消除女性话语权力缺失的途径等。本文通过分析英语语调性别差异形成的原因,讨论当前西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状况。

## 一、社会性别与英语语调性别差异特征

### (一) 社会性别定义

社会性别(gender)是上世纪70年代随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浪潮而诞生的一个新概念,经女权主义语言学家在有关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的持续努力下而逐渐被社会所接受。社会性别体现了性别的社会属性,即根植于生理性别(sex)基础上,由社会文化所建构的两性不同的特质。性别的社会属性依照传统文化对男女的行为、社会角

色、社会身份、社会期望和社会评价等方面约定俗成的要求,建立起一整套关于两性言谈举止的规范,并提出对两性不同社会角色扮演的期望,即形成了对性别言行的固化认知——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因此,人从出生开始就在生理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被按照社会性别规范进行持续不断地塑造,在认知意识、思想观念、言语和行为举止等方面均按照社会性别规约的要求给予学习和培养,直至形成并内化为社会性别所要求的行为方式和话语模式。简言之,社会性别是生理性别指涉的男女在社会文化建构下所形成的性别特征,涉及社会角色、行为方式和话语特征,以及对男女性别角色的不同期待和心理认知等诸多方面。

### (二) 语言性别差异

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领域,玛丽·凯伊(Mary Key)是较早对男女语言性别差异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之一,她于1970年发表了“男性/女性语言”(Male/Female Language)一文,其后又将其扩展为专著发表,1996年修订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凯伊对语言性别差异的研究,源于她发现在印第安人中一些词汇专属男性使用,女性不会也不能使用。这一发现使她认识到语言的性别差异就如男女性别角色差异一样,是一个普遍存在的

现象。她将语言性别差异归结为人们对男女智慧潜能的刻板认知,如认为男性语言更具有建设性、更实用也更复杂;而女性语言则显得愚蠢、头脑简单并且参杂了太多的情绪因素。<sup>[1] (P.4)</sup> 凯伊还是第一位在美国加州大学开设男性/女性语言课程的社会语言学家。

如果说凯伊在1970年所发表的有关语言性别差异的论文在当时还没有引起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界足够重视的话,那么,罗宾·莱柯芙(Robin Lakoff)提出的“女性语言”(Women's language)的观点则在社会语言学研究 and 女权主义学者中激起了较强烈的反响。莱柯芙于1975年发表了“语言与妇女的地位”(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简称为“LWP”)的文章,其后也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该书被认为是“开创了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语言与性别研究。”<sup>[2] (P.3)</sup> 莱柯芙谈及撰写该书的初衷是为了揭示女性如何看待自己,以及社会大众如何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认知女性的自然特征和所扮演的角色。换句话说,她所要分析的是语言如何描述女性,和女性在语言使用上有什么特点,以及隐含在语言与女性之中的社会文化内涵等问题。她在LWP中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女性在语言上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歧视:“一方面是教导女性如何使用语言,另一方面是语言在使用上对待女性的方式。”<sup>[3] (P.39)</sup> 她举例一个小女孩如果像男孩那样“谈吐粗野”,就会受到家长以及学校老师的训斥或嘲笑。小女孩从语言到行为均被规范于社会教导给她的既定轨道上,女性的自我认知也因此深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语言性别差异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女性更多地或倾向于使用所谓“正确”的或“标准”的话语形式。而这类标准语言通常是来自中上阶层并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语言形式作为样本建立的。如我们熟知的英国标准英语(RP或BBC英语),便是根据“英格兰南部家庭男性日常话语中最为普通的发音为标准,而这些家庭中的男性成员大都在英国一些知名的公学(私立寄宿学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sup>[4] (P.v)</sup> 因此,女性对标准语言形式的追求,实则是向某一类的男性话语形式靠拢,目的是希望借助语言的外在形式来达到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目的。按照这一逻辑,显然女性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普遍而言低于男性。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女权主义学者为唤起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认知,追求男女平等,通过各种方式批判语言方面的

性别刻板印象,积极推动建立颠覆男性中心主义的语言格局,进而在语言的层面消除性别差异,以此推动整个社会消除各种性别不平等现象。

### (三) 英语语调性别差异特征

莱柯芙认为在英语词汇选择、特定句法规则、语调(超音段)模式运用等层面均存在“女性语言”的情况。在描述女性语调的典型特征时,她指出女性在非疑问句型中更多的使用升调,而采用升调的部分原因是基于:“女性话语听起来较男性更‘友好’。而友好的特性是让整个决定成为开放的或是可选的,而不是强加的。”<sup>[3] (P.50)</sup> 根据语调功能理论,这类的升调一方面能显示说话人的友好态度和合作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说话人遵从的心态,是一种弱势的话语特征。<sup>[5] (P.18)</sup> 女性更多地使用这类语调模式除了让人感到亲切和友好外,也给人以女性缺乏自信的印象,显示出女性认为自己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性别认知心态。女性语言于是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非权力特征,即更多地采用合作、鼓励交流的话语形式,表现在语调上便是更多地使用带有征询、让对方确认的升调。莱柯芙便将女性更多地在非疑问句型的句子结尾处用升调的现象称为“女性的”、“非权力的”或“弱势的”语调模式,表明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女性、社会下层人士的语调中。由于使用人群的原因,该调型又被认为是低声望的语调类型。但由于莱柯芙的论述更多的是依据自己个人经验性的感受,没有足够的实证数据来支持其结论,因此莱柯芙的观点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

鲁思·布兰德(Ruth Brend)是较早关注英语语调运用上存在性别范式的语言学家,她撰写的“美国英语男性-女性语调范式”(Male-Female Intonation Patterns in American English)最早收录在1971年召开的第七届国际语音学大会的论文集中。布兰德发现在实际话语中某些语调范式是属于通用型的,而有些用法从性别角度却是专属的且女性的语调范式较男性的多。如在使用所谓“协商性”的升调范式时,男性语调上升的幅度远小于女性。在这种情况下,上升幅度较大的女性语调给人的感觉是更为亲切。同时,相较于男性,女性还更多地使用高降调来表示惊讶、意料之外等情绪。布兰德在文中还指出,虽然男女在句中停顿时都会使用表示话语还未完结的升调,但女性还会使用升-降-升语调范式来表示同样的意思,而这类的语调范式很少在男性中发现。另外,

只在女性中存在的语调范式包括:用升-降调来表示犹豫的情绪,以及用句末升调来表示友好、欢呼的情绪等。<sup>[6]</sup>兰德的论文虽然明确指出了某些语调范式在使用中存在性别差异,但布兰德的论文是纯描述性的,虽指出了现象却没有分析解释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更未讨论语调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意义。此外,她所指出的语调性别差异情况同莱柯芙的LWP一样,也没有任何实证研究的数据支持,仍是印象式的推断。较为遗憾的是布兰德的论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在布兰德之后少有同类型的研究成果。

笔者对IViE语料库中剑桥地区的语料所做的语音实验分析也表明女性被试在陈述句、特殊疑问句和感叹句等三种句型中,更多地使用了升调。而语调功能理论告诉我们,这几种句型的默认调型为降调,男性被试则更多地使用了降调。<sup>[7]</sup>下表为该语音实验各句型样本语料男女调型使用情况的统计结果,表中L%或H%分别表示调核边界调音高相对于调核重读音节音高是低还是高,边界调音高低于调核重读音节音高为降调,相反为升调。

IViE 语料库边界调音高性别差异统计

句型	女性边界 调为L%	女性边界 调为H%	男性边界 调为L%	男性边界 调为H%
1-陈述句	40%	60%	77%	23%
2-陈述疑问句	46%	54%	39%	61%
3-一般疑问句	39%	61%	45%	55%
4-特殊疑问句	57%	43%	73%	27%
5-感叹句	46%	54%	85%	15%

## 二、女性语调形成原因简析

由于英语语调在与句型匹配上非常灵活,因此语调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音高、音域和语调范式选择上。即性别刻板印象影响到人们对男女不同性别发音模式的认知和使用,这是造成语调性别差异最基本的原因。这类的刻板印象包括人们通常会认为男性典型的声音听起来应该都是比较低沉、略带沙哑并具有磁性。而女性声音往往音调较高但音质较柔和,带有呼吸的气声或是嗓门尖细。另外,人们还认为男人应该声音洪亮,而女性的声音应该轻柔舒缓。男女在发音上所显示出来的性别差异,自然也反映在英语语调上。男女在音高上因生理因素而存在自然的差异——女性音高普遍高于男性,但要分析和解释语调性别范式形成的原因,还需要用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考察语调。

社会语言学从认知和习得的角度,认为男女的语调习惯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并得到内化。美国英语中极端的男性语调特征是所谓的单一调(monotone),这样的语调让男性话语听起来暗含控制、过于冷静。总体而言男性的语调较女性更加平稳、肯定,语调音高也较女性低。而女性话语则表现出保持音高但改变声音响度的特点,女性较男性更常用问询、温和愉悦或者惊讶的语调,语调音高也普遍高于男性。女性语调使其话语显得友好,提供了避免与他人产生冲突的途径。同时,鼓励交流,避免武断地陈述。女性语调的这些特征有助于她们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感情,吸引和保持听者的注意力,女性在语调上的这些特征也使其话语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女性因社会地位的原因在语言上具有自己特殊的范式,反映在语调上便是女性的语调范式较男性更多样化。但从性别刻板印象所形成的观念以及语调的副语言学功能的角度,女性话语给人的印象则是相对地缺乏自信和缺少权威性。

语调作为话语交流的重要载体而成为人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调范式则是体现说话人社会地位、阶层以及性别等角色的指示器。女性为了消除性别特征所带来的社会地位较低或无权威性的社会普遍认知,有时不得不有意改变自己的女性语调特征。如英国首位女性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为了让英国民众能接受女性担任首相这一事实,不但在举止风格上处处显示出较为强悍的行为风格,并赢得“铁娘子”的尊称,她还努力改变自己作为女性所具有的典型女性语调等话语特征。由于在她之前的英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女性首相,因此,她被告知她的声音与其首相地位不相称,她的声音太“尖”了。而“尖”的声音对英国人而言,不具有权威性。为行使作为首相的权力和体现其权威,她接受建议改变自己的话语风格,通过降低音高、压缩音域、放慢说话的速度等方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具有权威感。经过努力,她的这种新的声音形式最终成为她的一个标志,也为英国公众所接受。<sup>[8] (P. 311)</sup>撒切尔夫人改变语调所遵循的标准无疑是英国社会文化所认定的权威性话语,即男性的话语特征或风格。

社会语言学研究对男女在语言和语调模式上存在差异已形成共识。但在解释形成语调运用上的性别差异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乃

至最终消除这些性别差异等问题上,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和理论。按照社会文化影响的观点,语言以及语音语调方面的性别差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后天不断被强化的性别认知和学习的结果。<sup>[9](P.18)</sup>凯伊也认为语言性别差异主要是因为社会对男女角色的期待和认知的不同,亦即是由性别的社会化所造成。<sup>[1](P.7)</sup>正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言:女性不是生来为女性的,而是后天造就的。对女性而言,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女性特征被不断地强化,在语调上形成可区分的典型女性语调特征就不难理解了。<sup>[10](P.93)</sup>社会文化习俗所形成的规约要求女性以符合其身份的方式来说话,而所谓符合其身份就是要符合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要求,如女性应该优雅、有礼貌,在言语交际中不应表现得咄咄逼人,而是要体现友好与合作。女性为了依照这些规约的要求而更多地使用升调类的调型,从而通过语调来满足这些刻板印象的要求。事实上,英语语调性别差异现象反映了在西方社会或英美这些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中,人们受性别认知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和男权制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双重影响。

由于社会性别差异主要源于社会地位或社会角色分工所导致的性别认知的不同,因此语调性别差异特征形成的基本原因应是社会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体现为男女在成长过程中所积累的性别社会规约认知和习得被内化为各自言行的基础,而社会对男女言行的规约则受到文化习俗所形成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深刻影响。这样,社会性别差异通过话语交际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期望,还强化了不同性别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地位。话语实践的结果是把女性固化在从属地位,而男权中心的社会结构则希望将性别差异归结为两性生理因素,是自然天生差异的结果。西方社会自上世纪6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以来,许多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大力宣传两性不平等不是天生的,而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结果,他们寄希望于在语言中去性别化的努力来达到尽量消除语言性别差异的状况,但到目前为止语调的性别差异现象依然存在。就如埃克特和麦康奈尔-吉内特(Eckert and McConnell-Ginet)所指出的“在美国文化中,仍然存在女性话语(或无话语权的公众)缺乏影响力的状况。”<sup>[9](P.180)</sup>

### 三、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与存在的问题

本文前述讨论已明确了升调是体现非权力话语或说话人遵从的语调模式,即用升调来表示对交际中的另一方的权力和决定的遵从,而女性更多地使用升调表明女性潜意识中会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话语权力较男性低。莱柯芙等女权主义学者认为女性语调范式多采用显示友好、尊重、征询式的升调显示了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她们认为在英语所属社会文化传统里女性大多处于社会权力之外,女性社会地位普遍较男性低的社会现实,并认为这是导致女性语言缺乏自信和没有权威性的根本原因。撒切尔夫人的例子便是最形象的注脚:即使她攀上了社会权力的顶峰,其女性话语特征仍给人以没有权威性而需要向男性化的话语标准靠拢。这种状况自然激起了女权主义学者的极大不满。

女权主义学者认为,形成语言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以男权制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传统,且这种情况已持续了数千年之久。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语言性别差异是社会文化与语言相互影响,因男权中心的社会文化形态而被相对固化的结果,而关注语言性别差异的目的在于揭示男性权力的非自然特性,即这种权力是由社会文化制度形成的。表现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男性基本上是以主动挑起并控制话题的方式来掌握交谈的主导权,更经常地打断对方的谈话,较少给对方反馈和提问,更频繁地转换话题,以及更多地使用陈述句型、使用显示优势的降调等,男性用这些方式来体现其权威和自信。而女性作为无权力的一方,在言语交际过程中通常处于被动、沉默的境地,同时还必须保持耐心和友好,女性话语风格于是表现出非权力的话语特征:更多地提问,因而更多地使用升调。此外,女性为了让听者重视自己的话语表达,必须在词汇之外更多地采用包括语调、形体动作等各种副语言学功能的辅助方法。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女权主义学者进而认为男性中心的社会体制长期以来对女性形成了压迫,使得女性更多的是被动接受由男性所制定的各种社会规范。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在Man Made Language(《男人创造语言》)中便指出:英语是男人的语言,是男性创造、并由男性所掌控<sup>[11](P.1-2)</sup>。她认为英语语言体现了独特的世界观,也决定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思想意识。英语的语言编码由于是男性的版本,语言反映的是

男性所关注的内容,文字带有男性的偏见,结果就是女性不得不使用并非属于自己思想意识的表达形式。由于西方传统社会中男性工作的比例远高于女性且占据了主要的关键工作岗位,因而无论是在私营企业还是在政府机构,大多数的领导岗位均由男性把持,一方面女性地位普遍低于男性的现实,另一方面即使同样的工作也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况,这些社会现实成为让女性更多地使用委婉形式的语言策略的主要原因。

针对这些现象,对语调性别特征的研究应更多地从现实社会中男女话语权力不平等的角度展开,集中讨论西方社会女性地位与权力缺失的机理和对女性话语影响的程度,通过探讨男女在话语交际中的表现和特征,以及分析不同性别所采用的言语交际策略等,寻求男女平等对话的机制,希望借话语实践来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最终达到尽可能地缩小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目标。德博拉·卡梅伦(Deborah Cameron)就提出,男女并非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而是我们文化中的一员,在我们的文化中充斥着大量有关性别话语的描述。人们不仅从中学习到性别话语,更根据自己的性别、社会角色和地位等状况在日常生活中有机地运用“恰当”的性别化的语言。<sup>[12] (P. 72)</sup> 斯彭德也指出“由于父权制的权力结构仍处于稳定的状态,这种社会结构对女性而言意味着很小的空间。男性作为占据优势的性别,虽然他们的观点只占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但他们却坚持认为只有他们的观点和价值观才是‘真正’的和唯一有价值的。”<sup>[11] (P. 1)</sup> 斯彭德认为语言帮助建构了人类社会,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真实状况,并指出男性权力中心的社会结构在语言中同样也反映了男性话语霸权的事实。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状况,女权主义学者掀起了在语言中使用中性词汇的所谓语言去性别化运动。他们认为,英语中有许多词汇是以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所创立的,如“history、chairman、spokesman”等等。同样的,一些在实际意义上表示中性的词却又使人联想到男性,如“he”泛指人类的“mankind”或“human”的使用等。她们主张使用诸如“chairperson、spokesperson”等所谓中性的词汇来代替含有男性指称的词汇。从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在有关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核心观点可以看出,她们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的问题日益关注,显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同时,她们

的研究也进一步发展了有关权力(特别是话语权力)与语言性别差异关系的理论观点。这样,女权主义学者用话语权力的观点来解释语言性别差异,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视角讨论语言性别差异的社会建构过程,揭示社会文化与语言的相互影响、互为建构的辩证关系,并由此批判男权中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希望以此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现状。然而,妇女运动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即使女权主义学者们通过努力能够改变语言的这些外在形式,但如果社会权力结构不发生改变,将很难从根本上消除语言和语调的性别差异现象。

女权主义学者希望通过讨论语言性别差异现象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来唤醒女性主体意识,进而推动妇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但从结果看,女权主义学者们的努力显然还未收到所期望的效果,结果并不让人乐观。分析个中原因,笔者认为主要问题包括:一是女权主义学者虽然强调男女间的社会性别差异对话语建构的影响,认为生物性别差异在话语中的表现,只有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下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希望透过在语言中去性别化来消除男女社会权力、地位不平等的现状。然而,可能令女权主义学者尴尬的现实却是,在女性话语建构上,面对坚固的男性权力中心的文化堡垒,在摆脱女性话语给人不自信、非权力话语特征这一刻板印象时,女性所能做的,并不是以自己的话语特征作为新的规范而得到社会文化的正面认同,却是下意识地或不得不依循主要依据男性话语特征而建立起来的标准语言。珍妮弗·科茨(Jennifer Coates)就指出在现今的职业女性或从政的女性中存在一种现象,即她们会根据其身份地位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声音和语调向代表话语权力的语调范式靠拢。<sup>[13] (P. 10)</sup> 就如前述撒切尔夫人在声音和语调上所做的改变一样,使用更低沉的声音,尽力采用典型男性化的话语特质,更多地使用降调而非升调的语调范式,在社会交往中采用更为自信的话语风格等,其结果显然是用男性的价值观来重塑女性自己。

二是西方社会自妇女解放运动以来,特别是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为了改变所谓女性语言缺乏自信的状况,出版了不少专门训练女性自信(assertiveness training)的培训教材并开办了相应的培训课程。这些培训材料大都基于女性由于社会地位和主要局限在家庭的传统,认为女性应更多地接受有关在社会公众场合谈话的

技能。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人们认为女性也需要接受增强自信心的培训。而培养女性在公众场合更具自信心地交谈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引导女性在谈话时更加直截了当。女权主义者认为在女性不断地加入到就业大军的情况下,这类的培训课程能够培养女性的自信和沟通的效能。同样让女权主义者感到尴尬的情况是,所谓自信的语言,实则就是以男性话语模式为样本的语言。这一事实显然与女权主义者希望以语言风格或模式的非性别化或者中性化来构建更为平等的男女社会关系的初衷相背离。可见,语调性别差异折射出的更多是社会文化所形成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强大影响力,只有改变性别刻板印象对男女社会角色扮演、言行等方面的规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中性别不平等的状况。

### 结语

语调性别差异现象折射出在西方社会或英美等主要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中,人们受性别认知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和男权制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双重影响。上述男女性别话语的问题反映了长期以来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构使得女性在与男性的对话中处于弱势地位,女性的话语也被认为是非标准的弱势话语,语言与性别的这一差异现象投射出男女在社会结构中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是女权主义者透过分析性别话语来批判男女间社会权力等方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希望在男女之间建立起平等的社会关系,以便在两性间做到平等对话,建构无性别差异特征的话语体系。然而现实却是女性为了摆脱这种弱势状况,不得不尽量采用所谓的标准话语,而标准话语通常是以男性话语模式为参照建立的,这就意味着就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言,女性仍不得不向男性的话语风格靠拢。因此,女权主义者虽然

其女性主体意识已然觉醒,但要通过改变男女话语权力不平等的现状,进而改变男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的不平等状况,则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在更广泛的层面唤醒女性主体意识。

### 参考文献:

- [1] Key, M. R. *Male/Female Language (2nd edn)* [M]. Lanham, Maryland: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1996. pp. 4, 7.
- [2] Lakoff, T. R.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M].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ed) Mary Bucholt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 Lakoff, T. R.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M].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ed) Mary Bucholt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4] Roach, P. and Hartman, J.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16th ed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v.
- [5] Tench, P. *The Intonation System of English* [M]. London: Cassel, 1996.
- [6] Brend, R. *Male - Female Intonation Patterns in American English* [A] // In Thorne, B and Henley N. (eds). *Language and sex: Difference and dominance* [C]. MA: Newbury House, 1975.
- [7] 蒋红柳. 英语高升调与女性语调特征 [J]. 实验科学与技术 2010(6).
- [8] Wardhaugh, 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3rd edn)*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9] Eckert, P. and McConnell-Ginet, S. *Language and Gende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0] [美]朱丽亚·伍德. 性别化的人生: 传播、性别与文化 [M]. 徐俊等译.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5.
- [11] Spender, D. *Man Made Language (2nd edn)* [M]. London: Pandora Press an imprint of Rivers Oram Press Limited. 1985.
- [12] Cameron, D. *On Language and Sexual Politics*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13] Coates, J. *Women, men and language: A Sociolinguistic Accoun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2nd edn)* [M]. Longman: London & New York, 1993.

收稿日期: 2011-06-29 责任编辑 苟正金